

《琵琶记》研究

王永炳 著

北京出版社

目 录

序

作者高明的生平事迹·····	(1)
一、时代·····	(1)
二、家世·····	(3)
三、生平·····	(6)
四、交游·····	(13)
五、文学艺术·····	(20)
《琵琶记》与南戏的复兴·····	(33)
一、南戏的发展概况·····	(33)
1. 错误的看法 ·····	(33)
2. 南戏的资料 ·····	(34)
3. 剧本的散佚 ·····	(37)
4. 南戏的壮大 ·····	(39)
5. 《琵琶记》适逢其时的出现 ·····	(40)
二、《琵琶记》的形成·····	(41)
1. 故事来源的历史根据 ·····	(41)
2. 有关故事及写作的传说 ·····	(42)
3. 《琵琶记》的改编·····	(50)
三、《琵琶记》在南戏中的地位·····	(54)
《琵琶记》在戏曲文学上的成就·····	(63)
一、内容丰厚·····	(64)
1. 宣扬子孝妻贤的思想·····	(64)

2. 反映科举时代不幸的一面	(66)
3. 流露对田园生活的向往	(70)
4. 揭发社会的罪恶与黑幕	(72)
二、结构谨严	(74)
三、手法灵活	(78)
四、排场妥善	(81)
五、音乐性强	(86)
六、词采高妙	(90)
1. 曲文	(90)
2. 宾白	(98)
3. 科诨	(105)
4. 造语用字	(106)
七、格律得失	(124)
1. 格律谱美处	(125)
2. 误律处	(129)
3. 韵协杂乱	(130)
八、形象鲜明	(142)
1. 蔡伯喈	(143)
2. 赵五娘	(146)
3. 牛小姐	(150)
4. 牛丞相	(152)
5. 张广才	(155)
6. 蔡公蔡婆	(157)
《琵琶记》排场的研究	(160)
附 参考书目	(238)
后记	

序

张敬

早期台湾大学中文系没有古典戏曲的课程，图书方面有关的参考资料既珍贵而又稀少。学子们想从事这方面的论文写作，假若不甘人云亦云的拾人牙慧作抄录，而想要作深入的探讨，有所心得表现；非要特加的勤搜博览，始能见出功效。当然有关戏曲音乐文学的认识，以及中国文字声韵的基础是必备的。比如曾永义教授当年硕士论文的《长生殿研究》，即是风晨雨夕不辞辛劳的跑南港中央研究院，废餐忘寝枯坐书案手披目送之下完成之作，至今说起来仍是兴奋的事。

这本《琵琶记研究》也是我所指导有关戏曲方面的论著。与其他谢碧霞《水浒传戏曲二十种研究》、王安祈《李玄玉戏曲十三种研究》、林鹤宜《阮大铖石巢四种》各篇，都属精心杰构，值得引以为荣的作品。最难得的是此文的作者身属外籍，而其汉学基础之佳，不输于国人。由行文用辞造句、畅所欲言在在可证。更可喜的是：举凡有关研治中国古典戏曲的先决条件莫不了解认识，如格律、排场、结构、韵协、词采、音乐，无论多艰深枯燥的部门，都一一探究克服，丝毫不作虚夸、皮相的文艺欣赏，而是道地硬整的学术论文。有关《琵

琵琶记》研究的作品，此篇可说是极有分量的，一丝不苟的佳作，此外不作第二人想。

书中有一特别的资料，在最后排场一章，引录了现在绍兴戏（越剧）及广东戏（粤剧）中几个段子，如越剧的南浦、描容、悲逢，粤剧的思家、庙会，与高明的古典戏曲作一比照，古今雅俗不同，各尽其妙非常有趣。也可见《琵琶记》故事的深入民间。

本书基本上在七十年代已写成。近年来经作者再行整理，筹办出版也有一段日子了。因为序文迄未交稿，以至拖延，真是愧疚。当年台师静农八十寿诞论文集中，拙作《琵琶记中的宝藏》一文，就是由想到此书的序文的事而引发的，这可能是对《琵琶记》的另一种研读方式的介绍，也是对《琵琶记》重视的品尝。

是为序。

清徽 一九九三年七月挥汗

作者高明的生平事迹

一、时 代

高则诚所处的时代，正是元朝走向衰微、崩溃和灭亡的时代。

元朝之所以很快地走上衰亡的道路，有几个因素：

(一) 帝位争执：自成宗（铁穆耳）到顺帝即位的近四十年内，就换了九个皇帝。每次的更易中至少有一半于嗣位时发生纠纷，掀起政变或战争；同时每次皇位继承的争执，多由臣下发动，实是史上罕见。因此，无形中削弱了元朝的统治力量。

(二) 土地夺占：蒙古贵族对土地的夺占是史无前例的；黄河以北的区域，大多数的农田变成蒙古贵族的牧场。长江以南虽无北方严重，但仍有不少田地被蒙古贵族和寺院占用，特别是则诚的家乡一带，遍布着南宋的官田，都被蒙古贵族和寺院占用。〔注一〕这样一来，中国的农业生产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从而毁灭了这个王朝的经济基础。

(三) 灾患捐税：蒙古族是游牧民族，根本不重视农业，当然也就不注意水利事业。根据史载：元代，黄河决口共有六十一一次之多。每次决口，都得驱使成千上万的人民抢救。〔注二〕这种灾难和徭役是非常沉重的，于是就在至正十一年（1351）元廷征发人民开黄河故道时爆发了反元运动。

除了水灾之外，其他灾患如旱灾、虫蝗灾等经常发生，造成严重的饥荒[注三]。处此情况下的人民已够苦，还要负担许多的苛捐杂税，更是苦不堪言，但是更惨于此的莫过于受到那批“输钱索物要酒浆，磨牙吮血如虎狼”[注四]的贪官污吏的敲榨了。在这种情况下生活的老百姓，真的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呵！[注五]

对这种黑无天日的惨不堪言的情形，则诚应是其中的目击者，亲身感受者，这也就是为什么则诚在《琵琶记》中把灾景描绘得那样精彩逼真，赚人热泪的原因了。

（四）种族歧视：元统治者把人民依贵贱分为四等，汉族分属第三、四等[注六]，又根据不同的职业把人分为十等，而“儒”介于“娼”、“丐”之间[注七]。读书人比娼妓还不如，这真是一大侮辱。则诚身为“最低等”的南人，又是“儒”者，对这种侮辱不会是无动于衷的吧。由于种族歧视，汉人南人参政的机会绝少，到后期为了拉拢汉人，算是放宽了一些。但即使做官，也是末秩。[注八]

起初，为了避免汉人南人参政，元统治者曾罢行科举一段时期，直到仁宗延祐二年(1315)才恢复。顺帝至元元年(1335)又罢行，至元六年为缓和反元情绪，又恢复。则诚就是此次恢复后的第五年考中进士的。但这时，反元运动此伏彼起，越来越壮大了。首先，方国珍在浙江造反（1348，即则诚进士及第后第三年）。至正十一年，北方的刘福通、陈友谅等为首的红巾军同时并起，南方则有朱元璋等。则诚大概是在至正十六年以前离职的，因为当时则诚被调任福建行省都事时途经方国珍所占据的庆元路，为方国珍强邀入幕，则诚力辞不从，并且当日辞官不干，隐居鄞县的栎社沈氏楼上，从事

《琵琶记》的写作。

总结所述，可知则诚的一生是生活在动荡不安的时代里，尤其是后半生——自己身为元朝小官的同时，又逢反元运动的日益壮大，则诚处在汉蒙冲突极端尖锐化的时期，不能没有矛盾，而他又是一个忧柔的儒者，当然不敢有明显的表示，所以必然深感苦闷与彷徨。这对则诚的文学生命却有着很大的影响，在《琵琶记》中，他对蔡伯喈那种苦闷与彷徨的心理活动刻划得那么细腻入微，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有人说：则诚借蔡伯喈倾吐自身的苦闷与彷徨，这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二、家 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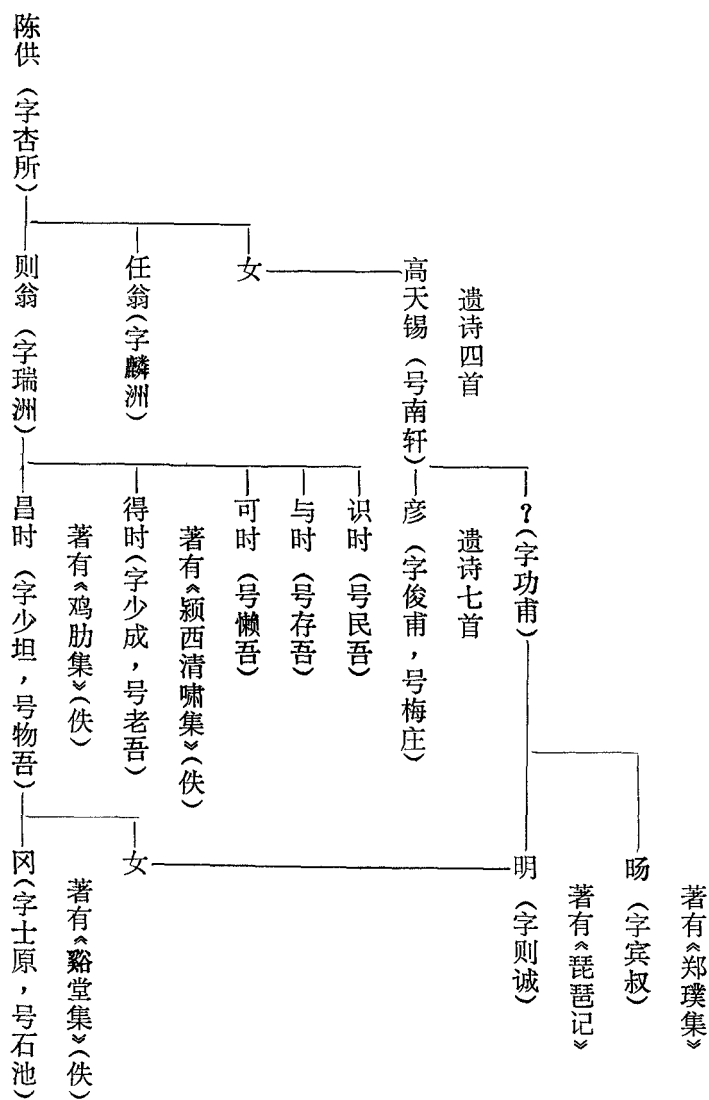
高明，字则诚，自号菜根道人。浙江省瑞安县人。关于则诚出生的籍贯，向来各家的记载不一：有永嘉、瑞安、平阳三种说法。产生这种不同说法的原因主要是则诚所生地阁巷地方位在三县交界的所在，历代隶属不同，所以说法不一，现隶属瑞安县。我们说他是瑞安县人是正确的。说他是永嘉人也可，因为永嘉是温州府的首县，以它来概括称呼，并不算错。永嘉地处浙东，因此他又被称为东嘉先生，或简称为东嘉。

根据明代一些文人的记载，温州的永嘉、瑞安、平阳三县是南戏的故乡。王国维在《录曲余谈》中说：“至南曲，则为温州人所擅”是中肯的说法。南曲在温州流行颇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叶子奇《草木子》中说：“俳优戏文，始于王魁，永嘉人作之。”这和徐文长《南词叙录》所说差不多：“南戏始于宋光宗朝”，祝允明《猥谈》更上推到北宋徽宗宣和(1119—1125)年间：“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谓之温州杂剧”。在风

气影响之下，不少的温州人确实编写了一些南曲戏文。当然，有剧本必须有演员演出才行，因此，在这南戏的故乡也一定产生了很多的演员，正如陆容在《菽园杂志》说的：“温州之永嘉，皆有习为倡优者，名曰：戏文子弟。”则诚生长在孕育南戏的摇篮地，半生耳濡目染的结果，自然会爱上为当时人民所喜爱的戏剧文学，终于自己也成为一个戏剧作家。

则诚能成为戏剧作家，是因为他生长在一个充满戏剧气息的环境里，但他的作品能成为杰作，在中国戏剧文学上占着崇高的地位，却是和他出身的家庭有着莫大的关系。除了他的父亲功甫早就去世不提外，他的祖父高天锡，伯父高彦，弟弟高旻都是有名气的诗人。与高家有密切关系的陈家，也是世代书香门第。高天锡的夫人是宋末隐士陈供的女儿。陈供的三子：兼善、则翁、任翁也都是诗人。则诚的夫人就是则翁的孙女。由上所述，我们可以肯定则诚自小在文学气氛非常浓厚的家庭里，过着“师友一门兄弟乐，文章独步子孙贤”的隐居生活。这对则诚以后的文学生活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关于则诚家世的资料，只有元裴庾阁巷陈挺《清颖一源集》崇儒高氏家编序有大略的提到外，余无所见。现就《清颖一源集》所提，取两家世系列表于后：[注九]



三、生 平

在过去，文人视戏曲为小道，戏曲作家地位不高，因之关于戏曲作家的生平少有记载，许多的戏曲作家也就落得“生平不详”。则诚还算是较幸运的一个，至少有几篇可靠的记载可帮助我们追查他的生平，虽不太准，可也差的不远。

则诚生于何年？只有从其弟宾叔着手。《苏平仲文集》卷五《郑璞集序》：“安固高君宾叔，才甚优学甚邃，长余二十余年[注十]，其伯兄则诚甫，又先左司僚友。高君于余父执也，而辱与为忘年友，今三十年矣。”苏平仲生于何时？《苏平仲文集》卷十五《赠徐季子》：“睿予阅世倏四十，守官太学垂五年。”《明史·苏伯衡传》：“岁丙午，用为国子学录，迁学正。”丙午为元顺帝至正二十六年（1366）。平仲居太学共六年[注十一]，即自至正二十六年至洪武四年（1366—1371），那么，平仲《赠徐季子》应是作于洪武三年（1370），上溯四十年，即可知苏平仲生于元文宗至顺二年（1331）。则诚弟宾叔比平仲大“二十余年”，保守地说宾叔比平仲大二十五岁，即宾叔生于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再由刘伯温致高则诚诗八首[注十二]来看，都是平辈口吻，所以则诚与伯温之间的年龄相差不大，现知伯温生于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那么则诚比其弟大一岁比伯温大六岁是最合理的了，所以可知则诚是生于元成宗大德九年（1305）。

卒于何年？不得而知。朱元璋即位那年即洪武元年（1368）曾召请则诚到南京修《元史》，他以心疾婉辞，不久，就死在宁海。因此，只能这样说：则诚卒于洪武二年或以后的一段不大长的时间。

则诚自小就非常聪明伶俐。这儿有二则故事：（一）有一日，他的父亲请客，他在桌旁偷食，客人见了，并知他“善属对”，有意试他一试，说：“童子不知道理，桌边窃食。”他立刻对上：“村人有甚文章，中场出丑。”客人再说：“细颈壶儿，敢向腰间出嘴。”他又对上：“平头锁子，却从肚里生濡。”〔注十三〕（二）“则诚六七岁时，即颖异不凡。邻有尚书某，绯袍出送客。则诚适自塾师处归，时衣绿衣，尚书戏语之曰：出水蛙儿穿绿袄，美目盼兮。则诚应声曰：落汤虾子着红衫，鞠躬如也。尚书大惊异，称为奇童。”〔注十四〕这些故事的真实性如何？不能确知，但考之瑞安县志本传所记：“聪明博学”，万姓统谱：“性聪敏，自少以博学称”，则诚自小聪明伶俐应是肯定的。

则诚长大后，发奋读《春秋》，“识圣人笔削大义”〔注十五〕，结果成为一个“学博而深，文高而瞻”〔注十六〕的学者。他是一个用世心很热的人，曾叹说：“人不明一经取第，虽博奚为？”〔注十七〕就这样他走上科举应试的道路。至正四年（1344）考中乡试，第二年考中进士。中举后即派往处州任“录事”。在任期间，学道爱人，治教修具，充分表现了他的治事才干：公正无私，果断保民。“监郡马僧家奴贪残为害，明委曲调护，民赖以安”〔注十八〕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对社会的风化事件也非常注意，如在处州时，请旌孝女陈妙珍，结果朝廷准请，“召有司具乌头双表之制，旌表其门，仍月给粟一斛，养其终身。时八年（1348）二月也。”〔注十九〕在短短的三年内，他的治事才干已深得当地百姓的赞颂，所以在他任满离去时，特立碑纪念，由好友刘伯温为文刻上。郡守前宪副使徐公对他非常的景仰，不忍他离去，亲率子弟向他讨

教，盛情难却，他因此教了一段短时间的书。不久，江浙行中书省杨廉夫知道则诚的才干，将他调任杭州行省“丞相掾”。在这儿再一次发挥他的办事能力，一时“儒生尚其才华，法吏推其练达”[注二十]。因此，每次他掾因故不能上班时，都由他兼任，堪称能者多劳。他为人鲠直，不苟同人意，意有不合，便上政事堂慷慨求去。也唯有如此，他才能不受旁人左右而取得办事的效果。杨廉夫对他非常满意，认为得到沙可学、高则诚、葛元哲三人，“而浙称治”[注二一]。这可说是则诚出仕以来最光辉的时期。

至正八年（1348）十一月，方国珍在浙东起兵。因为则诚是道地的温州人，对当地的地理环境比较熟悉，江浙行省改调他为浙东“闽幕都事”，参加平乱镇压的工作。第二年二月，则诚随军南征去了。在出发前，他的好友刘伯温以诗《从军诗五首送高则诚南征》送行。其中第二首：

江乡积阴气，二月春风寒。
壮士纓胡纓，伐鼓开洪澜。
长风翼万轴，撇若横海翰；
马衔伏辕门，翊卫森牙官。
伏钺指天狼，怒发冲危冠。

就很清楚地指明了南征的时间：二月，地点：海滨。第四首：

人言从军恶，我言从军好。
用兵非圣意，伐罪乃天讨。
运筹中坚内，决胜千里道。
雷霆馘蛟鼉，雨露泽枯槁。

怀柔首莛独，延访及黎老。
牧羊必除狼，种谷当去草。
凯歌奏大廷，天子长寿考。

从这首诗看来，刘伯温对则诚这次的南征，基本上是赞同的。可是，在南征的时候，则诚与领军的行省参政朵儿只班意见不合。当时情形可能是这样：则诚主张以军力招抚国珍，对于这一点，伯温是知道的，所以在送高则诚南征诗的第五首写着：“抚绥属有望，世世为尧民。”但朵儿只班主张进剿。于是，则诚再发一次“鲠”脾气，“避不治文书”[注二二]了，而朵儿只班一意追击国珍至福州，反被国珍所执。国珍势益张，结果元廷只好派“大司农达识帖木儿（前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对则诚甚为赞赏）至黄岩招降，国珍皆登拜。”[注二三]正与《赵汭送高则诚归永嘉序》：“于是师出愈三时，卒烦大臣自京师来，以上意抚之而后定”的话相合。

国珍乱事暂告平定，则诚也因任满还家。临走前夕，诸友人来访，都为他能稳守立场而道贺，并希望则诚能再出来作为一番，但这时则诚却感慨万千地说：“前辈谓士子抱腹笥，起乡里，达朝廷，取爵位如拾地芥，其荣至矣，孰知为忧患之始乎，余昔卑其言，于今乃信。”[注二四]这确是则诚的心底话。从话意里，可想而知则诚在宦海生涯的这些年期间，曾遭遇不少人为的磨难挫折。他的人格高尚，脾气鲠直，因论事而“数忤权贵”[注二五]而“避不治文书”，这是免不了的事。尤其是最后三年，随元军南征，那并不是他所愿，但又不能脱身，使他因受牵制而降志为俗吏，浑浑噩噩地照章行事，那更不可能。因此他的思想充满矛盾，内心的

忧愤无时或已，这时他深深觉得仕途的险恶，对于前辈的经验谈也就深信不疑了。现在任满赋归，这种重获自由的喜悦之情真是无可言表，他大可“与乡人子弟讲论诗书礼义，以时游赤城，雁荡诸山，俯涧泉而仰云木”[注二六]了。他有一首《送朱子昭赴都》的七律，正可说明他这时的心情。

西陵潮落船初发，念子辞家去觅官。
直欲持书上光范，不妨卖药过邯郸。
黄河雪消水乱走，紫禁花浓春尚寒。
如此江山足行乐，莫将尘土污儒冠。

在友人辞家觅官的时刻，则诚居然给他泼冷水，劝他勿将尘土玷污自己的儒生帽子，企图能说动友人打消觅官念头，强烈地透露了他那种厌弃、蔑视功名的心情。

他满心以为可像谢灵运那样地遨游山水林泉了，但哪里想到元在动乱的时候，亟需有德望的文人出来卖力，因此，退隐不久，又被召任江南行台掾，忽又改调福建行省都事。赴任途中，经过庆元时（至正十六年，1356），已经降元而任海道运粮漕万户的方国珍想强将他“留置幕下”，但他“力辞不从”；“又以礼延教子弟，亦不就”，并且“即日解官”不干。[注二七]

由于一些文人对则诚不受国珍的延聘而产生误解，认为他没有民族意识，所以在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则诚不愿留置国珍幕下，确实理由虽无法知道，但从国珍个人方面研究一下，就不难了解则诚为何“力辞不从”，并且“即日解官”了。

根据《方国珍传》[注二八]与吴梅村《国初群雄事略》，国珍的活动情况大致如下：

国珍兄弟原先在海上贩盐为业，与州人蔡某争盐贩成仇。不久，蔡聚众海上剽掠漕运，受官府赏格通缉，国珍欲捕蔡受赏，岂料蔡反自首并使赂减轻罪名，国珍甚为气愤：“蔡能为盗，我顾不能耶？”于是格杀巡检，入海劫粮艘梗运道。“时至正八年十一月也”。接着：

至正九年（1349）——行省参政朵儿只班追剿国珍至福州，反被国珍所执。

至正十年（1350）——国珍率众泊松门港索粮。

至正十一年（1351）——元遣大司农达识帖木儿至黄岩招降，国珍接受。

至正十二年（1352）——国珍复入海。六月，占据定光观，悉毁黄岩官居民舍。八月，进攻台州。

至正十三年至十五年（1353—1355）——剽掠台州、温州、庆元等路，元招谕不下。

至正十六年（1356）——三月，复降元朝，任海道运粮漕运万户，兼防御海道运粮万户。

至正十七年（1357）——八月，升任江浙行省参知政事，仍兼原职。

至正十八年（1358）——十二月，朱元璋取金华，派人招降国珍。

至正十九年（1359）——三月，国珍以次子为质，并愿献庆元等三路请降。朱元璋封国珍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但这时国珍颇有悔意，告老不任职。

至正廿一年至廿二年（1361—1362）——国珍态度暧昧不明，简直是阳奉阴违。朱元璋“累以书谕之，国珍阳为恐怖谢罪，以金宝饰鞍马献之，明祖却之。”

至正廿五年（1365）——国珍升任元朝淮南行省左丞相。

至正廿六年（1366）——四月，国珍向朱元璋贡银二万两。十月，国珍改任元朝江浙行省左丞相。

至正廿七年（1367）——二月，国珍既向朱元璋，“复阴泛海北通扩廓帖木儿，南交陈友谅”，朱元璋因他反复无常，“移书数其十二罪”。九月，朱元璋进兵讨伐；十二月，国珍最后降明，并且还说了漂亮话：“臣闻天下无道，乘桴浮于海，天上有道，束带立于朝。”“明祖笑而宥之，授广西行省左丞。”

以上所举的事实，说明了举棋不定的方国珍的面貌。对于没有立场，见风转舵，为个人利益而不择手段，而阳奉阴违的人，则诚当然是鄙薄有加的，自然不愿为国珍所延揽；同时另一方面，在反元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的时候，再想在仕途上做一番事业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何况他在仕途上受过磨难挫折，早就厌弃这种宦海生涯了。因此，则诚“即日解官”后，就没有再出仕。以后为避兵乱，避居鄞（宁波）栎社的沈氏楼上。〔注二九〕《琵琶记》的完稿，极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

至正十九年（1359）左右，则诚的好友刘伯温，同学宋濂等都加入朱元璋的队伍里去了，而则诚还在方国珍控制下的庆元。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曾召请则诚到南京修《元史》。一方面可能是太祖“闻其名”而思收罗，一方面也可能是他的同学宋濂、王祿、好友赵沅的推荐，因为他们都是纂修《元史》的主要负责人。如果则诚接受召请，《元史》上必有《高明传》，也不致累后人受遍搜之苦了。对于明太祖的召请，则诚以“老疾辞”。不久，就死在宁海。归葬于柏树桥南岸。